

近年來大陸地區日據及光復初期臺灣史研究概述

陳小沖*

摘 要

大陸地區開展臺灣史研究自 1980 年迄今已近四十年。其崛起與海峽兩岸關係的轉換有極大的關聯。1979 年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告對台方略從“解放臺灣”轉變為“和平統一”，政策變化後的對台工作需要智力的支撐，於是以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後改院）為代表的一批涉台研究單位陸續創建，臺灣史研究趨於興盛。近十年間儘管兩岸關係發展曲折，但臺灣史研究卻未曾受到負面影響，相反其“顯學”之地位日益穩固。如若檢索臺灣史相關著述與文章，當可拉出長串且炫目的清單。然而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大陸地區的臺灣史研究既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圖景，同時也存在著相當的泡沫成分，一批論文追風頭、趕時髦，學術水準較低。因此，本文將著力介紹大陸地區近年來較具代表性臺灣史研究成果，至於面上的論文目錄建議登錄中國知網查詢，不再贅述。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教授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以來都是臺灣史研究的熱點，這與臺灣史的特殊性有關。前面我們說過，臺灣史研究的崛起與兩岸關係發展密切關聯，不可避免地順應著政府和社會的需要而在研究問題取向上有所側重。早期臺灣史的研究重點無疑是鄭成功收復臺灣、康熙統一臺灣、林爽文為代表的臺灣農民起義、臺灣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等，在本文涉及的日據與光復初期歷史時期內，則有霧社事件為代表的日據時期抗日鬥爭以及臺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等。此外還舉辦了多場全國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系列論著和史料選編。

近十年間，臺灣史研究仍然以政治史為聚焦點，與前不同的是研究範圍的擴大、學術水準的提高及史料搜集整理大為加強。大致而言，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領域展開：

其一，臺灣共產黨研究。台共研究以臺灣學界為其發端，早期由於各種禁忌大陸方面反而研究步伐緩慢，近年來隨著思想解放和黨史研究領域的活躍，台共研究也被納入了學界的視野。其要者如張春英的《共產國際“左”傾錯誤與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的解體》(《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01期)，宋邦強的系列論文《日本侵佔時期臺灣共產黨政治綱領焦點問題評析》(《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4期)、《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分裂之研究》(《現代臺灣研究》2011年第2期)、《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3期)、《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對農民運動的影響》(《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3年第3期)、《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影響》(《理論月刊》2016年第5期)。其彙集成果是宋氏的《日據時期臺灣共產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該書為作者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出版，全書共分六個部分，分別是台共成立的歷史背景、成立經過、台共政治大綱、失敗原因、其與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及對臺灣政治運動的影響。然由於其依託的主要史料是《總督府警察沿革志》，在新史料挖掘和學術創新上均有待突破，個別論述存在較明顯的借鑒痕跡。總之，該書的意義在於作為大陸第一部研究臺灣共產黨的專門著作，對於人們系統瞭解台共發展史有一定的價值。與此同時，關於台共成立大會之中共指導者彭榮的研究亦興盛一時，主要論文有：梁化奎：《指導臺灣共產黨創建者詳考》(《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6期)，王鍵的《出席台共成立大會的中共代表“彭榮”身份辨析》(《北京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及筆者的《台共成立大會之中共指導者彭榮其人補論》(《臺灣研究集刊》2016年第5期)等等。彭榮其人究竟為誰？在學界長期視為疑案。或曰瞿秋白、或曰彭湃，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的共產國際史料集——《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為人們揭開了迷霧——任弼時說成為定論。後續學界發表的論文除了肯定彭榮即任弼時之外，主要是從各個角度論證其可信度。此謎團之得以水落石出，上述史料的發佈功不可沒。不過，儘管台共研究

已漸成氣候，其中的短板仍不容忽視，如台共內部矛盾、路線鬥爭、中共“左”傾錯誤影響之研究及謝雪紅、翁澤生等領導人的歷史評價等等，都有待進一步深化，其間的一些敏感問題（如左傾錯誤的責任、建設臺灣共和國的主張等）亦有待辨明與破解。

其二，二二八事件研究。二二八事件歷來是大陸學界重點關注的課題，早期官方將其定位為反抗國民黨暴政的人民起義，故又稱為二二八起義。近年來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和兩岸陸續公佈的豐富史料，人們對這一臺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了新的認識，目前普遍的提法是：二二八事件既是一場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鬥爭，同時也是臺灣人民爭取民主和地方自治運動。大致而言，近期大陸地區的二二八事件研究，較多集中於圍繞其周邊及陳儀其人的討論。如鄧孔昭的《陳儀與臺灣光復初期的文化重建》（《臺灣研究集刊》2011年第1期）馮琳的《國民黨退台初期向下紮根的嘗試》（《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05期）等，而二二八事件本身的研究卻稍顯不足。臺盟經年主辦相關會議，包括2017年大規模紀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活動，但大多數公開發表的文章較缺乏學術水準。在為數不多的論文中我們選擇兩篇較具代表性的論文予以介紹。第一篇是著名蔣介石研究學者中國社科院楊天石的《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蔣介石日記解讀》（《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楊天石在文中引述大量史料後認為，“既是抗暴，反對腐敗政治，又是騷亂；既有正義性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義與非理性的成分。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雙重性。”他主張：“28日以後，事件分別向不同方向發展。一是要求政治、經濟改革，一是奪械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一是要求臺灣‘獨立’或聯合國託管。”對於蔣介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文章表示蔣雖在事變初期要求實施“現時唯有懷柔”的政策，但對陳儀後續強力鎮壓，亦至少採取了默認的態度。對於二二八事件研究所應遵循的原則，他主張，“世界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許多歷史事件往往具有雙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們只看到其中一個方面，就很難掌握全貌。而當人們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誇張、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時，事件的真貌往往就更難以認識。”另一篇是北京大學張鈞凱的《作為思想問題的“二二八”》一文（《文化縱橫》2017年10月號），文章開宗明義指出：“發生在光復初期的二二八，牽涉到的不只是民族歷史的中斷與接續，還包括了更高範疇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為近代中國兩岸造成的傷害與遺留的瘡疤，至今都還制約著兩岸的互動與前景。70年後，已經到了讓二二八從歷史與政治迷霧之中走出來的時刻了。”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臺灣的被統治階級對於矛盾激化已深的官民結構的總體回應：打倒貪官污吏，要求民主自治。‘官逼民反’是較為接近事件本質，也具有常識性的判斷。”“二二八從來不是區域性的外省/本省之間的對立衝突，而是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的不滿的集中爆發。充分體現了轉折年代的人心向背，在客觀的態勢上成為了全國反蔣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對於迄今仍具一定敏感度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我們認為楊天石先生的提法或較具客觀性：它需要“冷靜、超脫的客觀立場和嚴格的科學態度”，以“還原歷史本相”。

其三，兩岸關係史研究。日據時期的海峽兩岸關係相較之前發生了轉折性的變

化，臺灣從中國的一個省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人成為所謂的日本國臣民，臺灣與大陸的關係從國內關係變成與日本殖民地之間的特殊的“國際關係”，臺灣人身份的改变也使得他們到了大陸之後成為日籍台人，產生了臺灣籍民這一特殊群體。而光復後臺灣重歸中國版圖，兩岸關係又復歸國內關係。近年來，日據時期兩岸關係研究方興未艾，並且隨著史料發掘整理工作的加強和諸多學者的加入，研究領域遍及方方面面。史料整理方面，有重量級的《館藏民國臺灣檔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6 年版)，和《臺灣義勇隊檔案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廈台關係史料選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臺灣光復史料選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及《近代廈台交流檔案資料選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等。著作方面有黃俊凌的《抗戰時期福建崇安縣的臺灣籍民》(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褚靜濤的《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13 年版)，筆者的《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相關論文有陳榕三的《日據時期閩台“三通”歷史變遷》(《現代臺灣研究》2010 年第 5 期)，毛章清的《略論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廈門的新聞殖民活動》(《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 年第 1 期)，趙國輝的《日據時期在廈臺灣籍民的司法管轄》(《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林星的《日據時期閩台農業交流的概況及特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2 年第 4 期)，張曉輝的《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與廣東》(同上)，許維勤的《臺胞在福建等地的抗日活動》(同上)，筆者的《試論臺胞在大陸的抗日活動及其對臺灣前途命運的思考》(《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4 期)，10、劉芳的《1900 年日軍登陸廈門事件再研究——著重中國大陸、日本、臺灣三方的互動》(《臺灣歷史研究》2014)，史吉祥的《日本殖民地博物館文化研究(上)(中)(下)——以關東廳博物館和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例》(《溥儀研究》2014 年第 2, 3, 4 期)，王琨的《殖民地臺灣與偽滿洲國“放送劇”研究(1937—1945)》(《臺灣研究集刊》2015 年第 2 期)和王海的《中日警察權與籍民管理之爭——以廈門警察分局事件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17 年第 3 期)等。光復前後的兩岸關係方面，有陳榕三的《光復前後閩台往來關係歷史變遷》(《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馮琳的《臺灣光復前國民黨對臺胞的宣傳及其缺失》(同上)，周偉亮、郭權的《“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與光復初期的臺灣警政》(《海峽教育研究》2016 年第 3 期)，馮琳的《開羅會議至戰後初期蔣介石的複台努力和主張》(《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5 期)，林星的《光復後閩台交流的特點——以赴台考察團為例》(《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4 年第 1 期)，莊恒愷、隋欣卉的《臺灣光復初期大陸學生赴台現象探析》(《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6 年第 6 期)，郭江山的《臺灣光復初期的“國語推行員”——以廈門人林良為研究對象》(《海峽教育研究》2016 年第 3 期)以及吳永甯、林真的《抗戰初期(1937-1938)在閩台民回復國籍論析》(《閩台文化研究》2017 年第 4 期)等等。上引論文只是相關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可以看出兩岸關係研究已然成為大陸臺灣史研究的一大亮點，個中的緣由自

是相關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地方學者基於檔案史料、地方文獻發掘而帶來的學術貢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不少新史料的發表與解讀（如武夷山檔案館的台民檔案，福建省檔案館的涉台檔案），這些檔案資料的陸續刊佈，給兩岸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海峽兩岸關係史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易於大陸臺灣史研究形成自身特色與優勢，相信未來很長的時期內，這個領域都將是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強大學術增長點。

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孔蘇鹽、劉小新的《1920年代臺灣左翼思想的興起及與東亞左翼知識圈的互動》（《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作者指出1920年代的臺灣左翼運動是中國、東亞和世界左翼運動的一部分，“臺灣左翼思想亦與東亞思想運動同步，它緊扣1920年代東亞局勢的發展，只有將其置於東亞左翼運動的整體性框架下加以探究，我們才能進一步把握臺灣左翼思想的形成與歷史位置，亦有助於我們理解臺灣左翼青年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的跨境路徑，以及東亞左翼知識圈的建構與互動等問題。”相關論文還有該作者的《論1927-1937年臺灣左翼思想的發展及問題》（《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和《潛流：1950-60年代臺灣左翼的存在形態》（《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7年第8期）等。我們認為，將臺灣史與東亞的關聯加以梳理，分析東亞區域歷史的交互嵌入性，是將來臺灣史研究值得探索的方向。

二、文化教育史研究

文化教育史是除了政治史之外的另一個熱點課題，在大陸學界文化熱的影響下，臺灣史也出現了開展文化歷史研究的小高潮，而教育問題對於高校系統的學者，則歷來是其關注的重點領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教育史研究的熱度有趕超政治史研究的趨勢。

近年來臺灣文化史的主要論著首推謝必震的《臺灣歷史與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該書在系統梳理臺灣文化發展歷程的同時，其內容並涵蓋了文學、音樂、美術、戲曲、工藝、舞蹈、電影、飲食、民俗信仰與宗教等等各個方面。與此類似的還有林仁川等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臺灣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一方面描述了臺灣文化的歷史淵源，表現形式與獨特魅力，另一方面展示了臺灣地域文化與中華主體文化的關係，認為閩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主要影響源，臺灣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體，並具備了海洋文化的顯著特徵。以下我們就近年來臺灣文化教育史相關主要論文予以簡要介紹。

（一）文化史研究

專著有尚紅娟著《臺灣地區公民教育發展中“文化認同”變遷之研究 1945-200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主要論文有鄒玲芝的《論光復前臺灣多元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民族論壇》2013 年第 5 期),陳韻的《抗戰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社會角色分析》(《福建論壇》2010 年第 5 期),陳名實的《日據時期臺灣儒學的本土化與民俗化》(同上 2010 年第 8 期),左玉河的《日據時期臺灣的墨學研究——以黃純青、連雅堂、張純甫等人為中心的考察》(《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楊齊福的《再論 1911 年梁啟超臺灣之行》(《學術評論》2012 年第 1 期),王瑩的《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習俗的演變》(《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 年 05 期),李晨的《從紀錄片跳舞時代看臺灣日據時期流行歌曲文化現代化的殖民性》(《華文文學》2011 年第 2 期),成喬明、謝建明的《殖民統治下臺灣音樂界反日活動考察》(《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2 年第 4 期),張曉鋒的《扶持與統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地區廣播事業的歷史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 年第 12 期),周海娟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在臺灣的戰時廣播宣傳》(《傳媒觀察》2014 年第 10 期),楊雄、曹立、葉佳梅的《殖民地開展體育運動的文化入侵和文化認同——以日據時期臺灣登山運動為例》(《體育科學研究》2015 年第 5 期),李曉紅、林豪的《日據時期臺灣電影產業的日本統制狀況研究》(《電影新作》2014 年第 4 期),林豪、李曉紅的《“皇民化”時期臺灣紀錄片的帝國記憶與殖民宣傳——以南進臺灣為例》(《當代電影》2016 年第 3 期),張羽的《臺灣地景書寫與文化認同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3 期)《殖民地臺灣與“滿洲”文化圈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3 期)《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糖業文化書寫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筆者的《日據時期臺灣宜蘭地方社會轉型初論(1895—1936 年)——以社會經濟與教育文化為視域》(《臺灣研究集刊》2013 年第 2 期),《碑刻文獻所見之日本在台殖民統治與社會變遷》(《臺灣研究集刊》2014 年第 6 期),張曉平的《語言轉換中的選擇——論日據時期臺灣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態》(《暨南學報》2014 年第 8 期),光復後臺灣文化研究有黃俊凌的《光復初期臺灣社會文化事業的重建與發展》(《閩台文化交流》2012 年第 3 期),葉泓的《臺灣省編譯館與光復初期創傷文化重建》(《時代報告(學術版)》2014 年第 10 期),王玉國的《從公會堂到中山堂:公共空間的歷史轉變——以臺灣光復前後的文化為中心》(《閩台文化研究》2015 年 2 期),何卓恩的《光復初期“臺灣文化協進會”宗旨與始末初探》(《蘭州學刊》2016 年第 1 期),歐陽月姣的《從“殖民地”到“國統區”:國族魅影籠罩下的臺灣去殖民化困境》(《臺灣研究集刊》2017 年第 4 期)等等。限於篇幅,還有許多的文化史類論文無法一一展示。從研究內容看,大陸學者在承認臺灣文化多元性的同時大多強調中華文化的主體地位,而對於日據時期至光復後的臺灣文化變遷軌跡,主張其大致沿著殖民-反殖民-同化-抵制(或受容)-再中國化線索進行。臺灣文化史的研究領域亦多姿多彩,既有傳統的宏觀文化闡述,也有地方文化的微觀透視,還有音樂、廣播、登山、博物館、紀錄片、公共空間等等的探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將抽象文化落地是其特點與趨勢。對於光復後轉折時代臺灣文化的研究,黃英哲教授的“去殖民化/再中國化”已成為大陸學界普

遍接受的敘述話語，但亦有人指出光復後臺灣的中國化與日據時期臺灣的日本化是不同的，前者並非絕然強制性而是帶有普遍的自覺性。

(二) 教育史研究

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日據時期及光復後的臺灣教育之所以受到普遍重視，就在於兩次的歷史性轉換帶給臺灣社會與臺灣人的思想觀念衝擊遠大於社會變遷帶來的物質現實衝擊，而構成思想衝擊的主要場域即是教育。無論是稱之同化教育還是曾在光復初期被提及的奴化教育抑或近年來將教育置於殖民現代性框架的解構恐均無法涵蓋日據時期的複雜狀況，光復後的再中國化教育同樣在自願與強制的爭論中糾結不清。客觀地說，任何執政者必依其指導思想貫徹執行其教育方針，日本殖民統治固然選擇同化方針，光復後國民政府之去殖民化再中國化政策亦為其必然之選擇，至於探索其如何與為何則是學者的責任與研究方向。

近年來的臺灣教育史研究擇其要者，在論著方面有黃新憲的《臺灣教育：從日據到光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全書共分 16 章，全面地論述了日據至光復後臺灣教育發展的歷史，認為這一時期的臺灣教育經歷了從殖民教育到愛國教育的發展，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在論文方面，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有黃新憲的《日據時期臺灣女子留學日本考》(《教育評論》2010 年第 4 期)《日據時期臺灣職業教育探討》(同上 2012 年第 2 期)《日據時期臺灣小學校初探》(同上 2012 年第 4 期)，蔡培瑜的《日據時期臺灣高等學校的創立與發展——基於臺北帝國大學的研究》(《教育與考試》2012 年第 3 期)，筆者的《日據初期臺灣的書房調查及殖民地教育整編》(《臺灣研究集刊》2010 年第 4 期)《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課程與教科書析論》(同上 2015 年 4 期)，都斌的《日據時期臺灣“同化教育”研究——以“國(日)語同化”政策為中心》(《抗戰史料研究》2012 年第 2 期)，許彬彬、李無未的《日據初期臺灣閩南話會話課本教學和方言史價值》(《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2 期)，吳麗仙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的教育活動》(《海峽教育研究》2013 年第 1 期)，曾繁相的《論日據時期殖民地經濟政策對臺灣職業教育發展的制約》(《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6 期)，石嘉的《近代以來臺灣的留日教育》(《北京社會科學》2015 年 10 期)等。光復初期臺灣教育史研究有褚靜濤的《臺灣教育的接收與重建》(《民國檔案》2013 年第 1 期)，崔明海的《光復初期臺灣國語運動的開展及其社會影響》(《抗日戰爭研究》2013 年第 2 期)，隋欣卉的《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狀況》(《海峽教育研究》2013 年第 1 期)，鄭巍的《試論光復初期的臺灣高等教育》(《現代臺灣研究》2013 年第 4 期)，劉凱軍的《光復初期臺灣國語教育的師資問題》(《江漢大學學報》2014 年第 1 期)，朱希敏的《光復初期臺灣國語運動與國語教育重建》(《教育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黃俊凌的《光復初期臺灣教育視導制度析論》(《閩台文化研究》2017 年第 1 期)等。由此可見，臺灣教育史研究的涉及面相當廣泛，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到留學教育乃至閩南方言均有文章

論及，日據時期的同化教育方針和光復後國語運動等傳統議題也得到繼續關注，不過相對於其他領域的研究，教育史研究儘管十分熱絡，但無論在史料的發掘或是學術水準的提升上，讓人眼前一亮的優秀文章卻較為少見，這有待於學界的繼續努力。

三、經濟史研究

經濟史研究歷來是大陸臺灣史研究較為薄弱的環節，日據時期及光復後臺灣史研究亦不能外，總的來說學界專業從事臺灣經濟史研究人數較少，有時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偶爾客串研究該領域，因此往往缺乏系統或顯示出散亂的局面。

近年來的日據時期與光復後臺灣經濟史研究，在專著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王鍵的《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 1895-1945》(上、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日據時期臺灣米糖經濟史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0 年版)，前者對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指出日本殖民者發展臺灣經濟多非為臺灣自身的需要和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為了將其變為資本輸出地、商品傾銷地和原料來源地。後者特別就日據時期的兩大產業米糖做了細緻分析，涉及米糖相剋問題、土著資本問題、日本糖業資本擴張問題等，揭示了臺灣經濟的殖民地屬性。這兩部著作卷帙浩瀚，既有作者的自身的見解也吸收了海內外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是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的重要參考書。光復後的相關著作有程朝雲的《戰後臺灣農會研究 1945-1975》(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4 年版)。

在臺灣經濟史相關論文方面，日據時期主要有陳豔雲的《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南洋種養業的調查與日本南進政策》(《求索》2010 年第 8 期)，王林楠的《日據時期臺灣煤礦業的發展變遷》(《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10 年第 1 期)，筆者的《日據時期臺灣移民問題初探》(《臺灣研究》2010 年第 2 期)，潘健的《日據時期的臺灣紅茶業》(《廣東社會科學》2012 年第 6 期)《日據時期臺灣茶業同業組織制度變遷探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12 期)《日據時期台海商貿的異化與延續——以臺灣“條約港”與“特別輸出入港”為中心》(《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6 期)，武政文的《日本統治時期臺灣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特點及啟示》(《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4 期)，李博強的《甲午戰後日本對臺灣地區的鹽業調查》(《臺灣歷史研究》2014 年)，林敏容的《日據時代臺灣鹽對香港、澳門的輸出》(《海洋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王玉國的《日據時期臺灣茶業同業組織業務演變述論》(《閩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 3 期)，周翔鶴的《宗主國中小資本在殖民地——以日據時期臺灣“米糖相克”問題為例的研究》(《臺灣歷史研究》2015 年)，周詩吟的《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土地清丈對臺灣的影響》(《財經政法資訊》2015 年第 6 期)等。光復後臺灣經濟史研究主要論文有程朝雲的《光復初期臺灣化肥工業的接收與重建 1945-1949》(《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汪小平的《臺灣光復初期陳儀的財政政策及其效果》（《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 年 10 期），黃俊凌的《臺灣光復初期善後救濟業務之探析》（《惠州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臺灣與琉球經貿關係初探——以國民黨當局台琉經貿政策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15 年 5 期），郭小燕的《臺灣光復初期行總救濟麵粉的施放》（《惠州學院學報》2017 年第 4 期），張躍的《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臺灣經濟改革的再思考——基於唯思史觀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2017 年第 5 期），程朝雲的《戰時財政背景下的金門土地改革 1952-1957》（《軍事歷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等。

從上述日據時期及光復初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描述看，呈現出以下特點：即研究議題較散，未形成熱點課題和集聚效應；農會、茶葉與鹽業的研究成為若干學者的共同關注點。在經濟史研究中，張躍的論文《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臺灣經濟改革的再思考——基於唯思史觀的視角》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作者提出以唯思史觀研究戰後臺灣經濟史，他的主要觀點是：唯思史觀認為人類社會主要是依靠思想力推動前行的，人類社會每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和長期繁榮都是思想解放、文化進步、觀念更新、制度創新的結果。因此經濟學研究不能僅僅以所謂科學的方法研究客觀物質資料、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因為它忽視了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主動性和主導性，應當注重思想、制度、政策等等是如何作用於經濟及其變化的。唯此經濟學科才能真正成為“人的科學”而不是“物的科學”。1950 年代的臺灣經濟政策受制於孫中山民生主義核心思想“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提出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方針，在光復後接收臺灣經濟部門的過程中極力擴張國家資本，1946 年政府控制的統制性經濟占了全台 70% 的產業和 72% 的土地。而自由經濟在臺灣的落地則與蔣碩傑與尹仲容的相遇息息相關，正是由於尹氏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新思想，對臺灣經濟改革的關鍵性決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緊接著 1952-54 年的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大辯論徹底改變了臺灣統治者的思想觀念，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使得臺灣開始了經濟起飛。作者曾經發表多篇文章推介唯思史觀，稱之為經濟學的創新論述。唯思史觀的提出誠然提供了一條新角度觀察經濟問題的路徑，但顯然與主流的唯物史觀有所抵牾，後者主張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儘管也提出反作用力的觀點，然其與唯思史觀強調的思想觀念決定論無疑有截然不同的意涵，在一些學者看來後者甚或可歸於唯心主義史觀之內。究竟應如何看待這一主張，值得後續持續關注其發展。

四、文學史研究

臺灣文學史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臺灣文史中研究最繁榮的一個領域，臺灣文學與文學史研究在大陸臺灣研究界無論是研究者人數或是研究群體活躍度上，已超越

臺灣史研究，呈現百花齊放、碩果累累的局面，頗令吾等汗顏。至於近年來的臺灣文學史研究，其論著之豐不是短短一節簡述可以涵蓋的，故僅舉其要者予以介紹。

在專著方面，根據朱雙一教授的統計從 2008 年至 2014 年，大陸學界專以臺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就有 60 部左右（尚不包括台港澳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著作）。以下舉其要者予以介紹。文學史類著作（含某一文體的發展史）有古遠清的《臺灣當代新詩史》（臺北：文津出版社 2008 年版），方忠的《臺灣散文縱橫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章亞昕的《二十世紀臺灣詩歌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 年版），古遠清的《海峽兩岸文學關係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朱雙一的《臺灣文學創作思潮簡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張清芳、陳愛強的《臺灣當代散文藝術流變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黃萬華的《多源多流：雙甲子臺灣文學（史）》（廣州：花城出版社 2014 年版），徐樂眉的《百年臺灣電影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6 年版）；斷代史或史論性質的有傅蓉蓉的《當代臺灣文學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年版），古遠清的《幾度飄零大陸赴台文人沉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朱雙一的《穿行臺灣文學兩甲子》（廣州：花城出版社 2014 年版）。專題理論探討如朱雙一的《臺灣文學與中華地域文化》（廈門：鷺江出版社 2008 年版），古繼堂的《臺灣文學與中華傳統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年版），計璧瑞的《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汪景壽的《臺灣文學的民族傳統》（廣州：花城出版社 2012 年版），樊洛平、王萌的《海峽兩岸女性小說歷史流脈與創作比較》（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此外對臺灣傳統文學的探討有黃乃江的《臺灣詩鐘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東南壇坫第一家——菽莊吟社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 2011 年版），丘鑄昌的《臺灣近代三大詩人評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陳娟英的《板橋林家與閩台詩人林爾嘉》（福州：海風出版社 2011 年版），等等。

相關文學史論文方面，有劉小新的《臺灣文學研究中的殖民現代性幽靈》（《東南學術》2009 年第 5 期），藍天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形態的嬗變》（《學術與交流》，2009 年第 8 期），陳美霞的《現代性與臺灣日據時期通俗文學論述》（《華文文學》2009 年第 2 期），朱雙一的《從祖國接受和反思現代性——以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祖國之旅為中心的考察》（《臺灣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計璧瑞的《文學書寫中的殖民現代性表徵及其文化政治寓意》（《華文文學》2010 年第 3 期），沐昀的《本土立場與東方視野——呂赫若日記初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 年第 5 期），高平的《日據初期臺灣漢詩領袖粉山衣洲詩學研究》（《外國文學》2010 年第 1 期），張羽的《日據時期臺灣醫師的疾病醫療書寫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0 年第 2 期），馬英萍的《日據時期臺灣文學評論四階段簡評》（《臺灣研究》2011 年第 1 期），黃萬華的《去殖民性進程中的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臺灣研究集刊》2011 年第 2 期），張暢的《論海峽兩岸鄉土抗日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1 期），馬泰祥的《殖民地身份認同與左翼傾向——以《臺灣新文

學》(1935-1937)創作群體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13年第2期),黎湘萍的《臺灣光復初期公共領域的建立與文學的位置:1945~1949》(《華文文學》2013年第1期),馬泰祥的《殖民地左翼文學刊物的堅持與潰敗:《臺灣新文學》(1935—1937)之文化生產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4年第5期)《在臺灣文學史知識序列的建構中——論日據臺灣日語文學創作與文學歸屬問題》(《華文文學》2015年第5期),樊洛平的《面對殖民現代化的質疑和批判——以日據時代的臺灣小說創作為例》(《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馬泰祥的《日據臺灣作家的日語創作實況及其意義》(《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郭俊超的《鄉土文學:概念的理論想像與形構——以臺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郭麗平的《臺灣內渡文人的心態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和李鈞的《專題研究:深化臺灣新文學研究的最佳路徑——以1926-2016:臺灣小說中的中華敘事研究為例》(《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等。

透過上述臺灣文學史研究成果的簡短展示,我們可以看到學界對臺灣文學史、斷代史和專題討論的諸多探討和對臺灣文學整體發展及某一文體發展歷史的詳細梳理。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學史研究者對於臺灣文學的定位,早在1990年代初就已經相當明確:“一方面它是中國一個省區文學,平列於中國諸多省區的文學之中;另一方面,又因其特殊歷史際遇所形成的與大陸各省區文學不同的進程、形態和積累,超出了一般省區文學的意義”(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等:《臺灣文學史》,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頁)。因此,近年來的大陸臺灣文學史研究既有對臺灣文學的中華敘事、臺灣文學與中華文化、臺灣文學與民族傳統等等的闡述,也有對於臺灣文學的地域特色的描述及其互動的討論,認為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譬如朱雙一在《臺灣文學與中華地域文化》一書中開宗明義點出其“試圖從臺灣原住民和閩粵族群創作所體現的本土地域文化特色和1949年前後隨國民黨退居臺灣的各省作家帶來全國各地域文化因素等兩個方面,來論證臺灣文學和文化儘管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卻仍保持著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基調,因此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中比較特殊的一元。”自然,其中便不能不牽涉到臺灣文化多元性和究竟哪一種文化佔據著主導地位的討論,從這一角度而言,當前海峽兩岸的主流臺灣文學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認知落差。這也正是兩岸學者應作進一步交流討論的地方。此外,對於臺灣文學史中的鄉土文學論爭及其流變、殖民現代性論述、臺灣文學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等,亦開始有學者提出了反思。更有學者提出重寫中國文學史的主張,因為臺灣文學在中國新文學史中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始終沒有一部令人滿意的有機融合兩岸文學的整體性的新中國文學史的出現,令人不無遺憾。

五、原住民歷史研究

臺灣最早的居民無疑是原住民（亦稱臺灣少數民族），其歷史大致可分為遠古至荷據及荷據之後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前期儘管有來自大陸政權多次經略活動的外部刺激，總的來說屬於原住民族的自然歷史發展時期；後期則伴隨著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大陸漢人的大量移民及淪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其自然歷史發展進程被打破，進入了與他民族相競爭與融合的發展階段。我們關注的時間點（日據時代與光復後）則屬於臺灣原住民近現代歷史，近年來相關研究有日漸熱絡的趨勢。

臺灣原住民歷史的主要專著有陳建樾的《臺灣原住民歷史與政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全書共分 6 章，但僅其中緒論及第 1 至第 4 章為原住民歷史研究，其他章節其實與原住民歷史問題沒有直接關係。書中回顧了新中國臺灣原住民研究的歷史，並就荷蘭西班牙日本殖民地下的原住民政策、皇民化運動與原住民、基督教與原住民乃至原住民“自治”“正名”活動等等進行了研究。作者為大陸長期研究臺灣少數民族的學者，著有諸多成果，在目前大陸地區臺灣原住民研究中屬於較高水準。

其餘主要相關論文有吳春明的《跨文化視野下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認知與“族稱”》（《臺灣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彭聽的《臺灣高山族日據時期重要文獻簡述》（《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0 年第 5 期），李理的《日據臺灣時期警察對原住民的綏撫與鎮壓》（《抗日戰爭研究》2010 年第 4 期），王鍵的《日據時期臺灣少數民族武裝抗日鬥爭探析》（《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楊曉斌的《日據時期臺灣蕃童教育考》（《教育評論》2011 年第 6 期），張崇根的《日據時期的臺灣民族學調查與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2 年第 4 期），崔曉陽的《日據時期臺灣長老會原住民傳教活動及其衰落探析》（《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2 年第 4 期），賈益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語境中的吳鳳傳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6 期），陶道強、秦家偉的《日據臺灣初期的“撫墾署”述論》（《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4 期），李穎、陶道強的《日據後期臺灣山地政策述論》（《經濟與社會發展》2015 年 3 期），陸卓寧的《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境遇與文化認同問題》（《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6 年第 1 期），李細珠的《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理蕃政策真相——讀傅琪怡著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抗日歷史研究》（《臺灣研究》2017 年第 2 期），王湛的《日據時期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山地的控制和掠奪》（《福建史志》2017 年第 2 期），賈益的《近代中華民族認同中的日月潭番社景觀》（《青海民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董建輝、周慧慧的《從霧社事件看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5 期）等。光復初期的有陳建樾的《統一國語與建構國族：臺灣光復初期山地國語運動的思考脈絡》（《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3 期）和馬英萍的《臺灣“霧社事件”的日本文學書寫——戰後至今的文本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6 期）等。綜合上述，原住民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據時期，研究方向為原住民的抗日鬥爭、殖民當局的政策和霧社事件。其中兩篇文章值得關注：一是董建輝、周慧慧的《從霧社事件看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

論文探討了以往較為忽略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分析了日據時期臺灣原住民族群關係和殖民者施政，不回避當時原住民自身相互之間的矛盾，認為第二次霧社事件是總督府“以蕃制蕃”策略的一次極端表演。事件後新政的實施，則改變了臺灣原住民社會結構和文化關係，使其族群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另一篇是賈益的《近代中華民族認同中的日月潭番社景觀》，通過日月潭景觀的人文變遷透視其間的文化意義，指出：日月潭從清代“水沙浮嶼”“番人向化”的象徵，至日據時期臺灣新八景代表的國家控制與理蕃典範，再到光復後中華認同下的臺灣西湖和光華島，日月潭與其說是自然景觀，不如說在人們的刻意解讀下成為了“民族景觀”，這種深入景觀內部文化意蘊與權力關係的分析方法，在歷史研究領域較具新意。

六、歷史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歷來是大陸歷史研究的傳統議題，也是臺灣史研究的熱點。早期的人物研究多集中在鄭成功、施琅、林爽文、劉銘傳、丘逢甲研究等。近年來日據時期及光復初期臺灣人物研究開始得到重視和開展，這與臺灣史研究逐漸偏向近現代史有關。於是林獻堂、蔣渭水、陳儀等歷史人物研究的論著逐步多了起來，2008年9月在河南開封舉辦的《林獻堂、蔣渭水與臺灣歷史人物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則標誌著相關研究的一個高潮。

近年來的臺灣歷史人物研究在專著方面，日據時期主要有康化夷、康詠秋的《黎景嵩與乙未反割台鬥爭》（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丘鑄昌的《臺灣近代三大詩人評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王穎的《霧峰傳奇——臺灣抗日英雄林正亨生死傳奇》（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政協宿遷市宿遷區委會編：《民族英雄楊泗洪》（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孫風華的《章太炎、連橫民族文化思想之比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林泉的《臺灣近代歷史的全新視角——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前輩臺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嚴如平、賀淵的《陳儀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光復後則有王小平的《光復初期赴台知識份子初探——以許壽裳、黎烈文、台靜農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在相關論文方面，有陳忠純的《張之洞“援外保台”思路演變及其與“臺灣民主國”關係考論》（《臺灣研究集刊》2011年第3期），徐博東、黃志平的《乙未武裝反割台義軍統領吳湯興、徐驤、邱國霖大陸祖籍考》（《臺灣研究》2015年第6期），楊淑雲的：《從培遠堂聯額看丘逢甲乙未內渡初期的心態與情志》（《大眾文藝》2010年第14期），冀滿紅的《丘逢甲與南洋華僑》（《東南亞研究》2010年第6期），楊齊福的《再論1911年梁啟超臺灣之行》（《學術評論》2012年第1期），倪霞的《日據初期後藤新平與臺灣殖民地初等教育》（《武夷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趙一順的《宋

斐如抗日思想述論》(《臺灣光復六十五周年暨抗戰史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李鑫的《臺灣作家許地山抗日愛國思想與活動述論》(同上)，武繼平的《郁達夫訪台史實考訂》(《東嶽論叢》2011 年第 3 期)，嚴泉的《蔣渭水思想文化遺產與兩岸共同歷史記憶構建》(《現代臺灣研究》2013 年第 1 期)，楊彥傑的《許壽裳與臺灣光復初期的民族文化重建》(《臺灣歷史研究》2015 年)，李細珠的《臺灣光復初期許壽裳若干史實考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3 期)，褚靜濤《陳儀與日據下臺灣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09 年第 2 期)，肖如平的《臺灣省主席陳誠與蔣介石的合作與衝突》(《臺灣研究集刊》2014 年第 1 期)，

從臺灣歷史人物研究的趨向看，梁啟超、連橫、許壽裳為諸多學者關注，梁啟超的研究，既有歷史學者也有文學研究者，連橫由於其愛國史家、著名報人的定位，受到較大的關注，而許壽裳的研究的興盛則由於新史料的刊佈為其契機，黃英哲、許雪姬、楊彥傑諸位教授發佈與出版的相關史料和在泉州閩台緣博物館召開的研討會，激發了研究者的熱情。再則從研究範式而言，人們在研究臺灣歷史人物時，注意將其納入中國近代史的大框架內予以考察，譬如連橫、林獻堂、林祖密、林正亨等的祖國認同問題，光復後赴台大陸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及其大陸情懷等。不過，大陸學界的臺灣歷史人物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盲點，即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在台日本人物的研究十分薄弱，除了個別的如伊澤修二、後藤新平討論外，可謂成果寥寥，這是需要認真對待與亟待補齊的短板。

最後有必要提及介紹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相關研究成果的幾部重要著作。第一本是張海鵬、李細珠主編的《當代中國臺灣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版)，全書共分六章(臺灣通史撰寫與理論方法、明以前臺灣史研究、清代臺灣史研究、日據時期臺灣史研究、臺灣光復與重建研究、1949 年以後臺灣史研究)，系統梳理了大陸地區學界的研究成果，“每章基本上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按問題述評重要研究論著的學術貢獻，清理相關問題研究的發展脈絡；二是概述重要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出版情況，提供相關研究資料線索；三是指出既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指明新的研究方向”(第 3 頁)。第二本是李細珠主編的《中國大陸臺灣史書目提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版)，書中收集 1949 年以來的大陸臺灣史研究主要著作與資料書目(含大陸學者在臺灣及海外出版者)，對臺灣研究工具書和主要研究期刊與集刊進行簡明扼要的介紹。第三本是曾惠民、司方維的《臺灣文學研究 35 年(1979-2013)》(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版)，對 35 年間臺灣文學與文學史研究的狀況作全面的描述，分進程篇、專題篇、學者篇和史料篇。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再簡略總結近年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幾個特點：

一是地域特色，即作者群的地域所屬大多為福建學者，但同時作者地域範圍也有趨於擴大的態勢。這一特色的形成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福建臺灣一衣帶水，二者的關係有所謂“五緣”之說，且不論其是否具備嚴格的學術意涵，閩台之間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等關係之密切，毋庸置疑。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福建學者

對臺灣有天然的親近感和瞭解欲望，又因其身處臺灣人的原鄉，對臺灣文化臺灣人性格較有相對更近的切身感受，資料搜集較易。因此，大陸臺灣史研究群的福建地域特色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此正如研究港澳以廣東學者為主、研究朝鮮以遼寧等東北學者為主一樣。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其他地方的臺灣史研究學者的崛起，由於臺灣研究在大陸已蔚為熱潮，導致無論東西南北各個地方，都有臺灣史研究者的存在，這也是其他區域歷史研究較少出現的現象，反映了臺灣研究的特殊性。不過若論專業研究機構，目前仍然是南北兩個重鎮並峙的局面，即以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為主。

二是史料整理成效卓著，但仍有較大發展空間。近年來的臺灣歷史資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除了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與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共同編纂的《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6 年版）洋洋 300 冊之外，又整理出版有陳支平主編的《臺灣文獻彙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尹全海、龐媛媛主編的《中央政府賑濟臺灣文獻·民國卷》（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年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合編的《明清宮藏閩台關係檔案彙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等，各類史料，卷帙浩瀚。它們是自臺灣銀行本《臺灣文獻叢刊》印行半個世紀來又一次規模龐大的臺灣歷史資料發掘整理工作，對於臺灣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發揮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然而，大陸對於臺灣歷史資料的發現與整理之潛力當遠不止於此，在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還有不少的臺灣史料有待“出土”面世自不待言，各地方檔案收藏單位也有豐富的相關資料有待開發利用，譬如福建省、廈門市、武夷山市（原崇安縣）以及漳州泉州的地方縣市檔案館和地方誌委員會，都典藏不少的涉台珍貴史料，相信假以時日會有更多的驚喜發生。

三是臺灣史研究的領域與研究範式有待拓展與提升。平心而論，近年來大陸地區的臺灣史研究雖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但從研究方法、研究領域和研究深度各個方面來看，仍有相當的提升空間。我們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尚未充分吸收各個學科理論而為臺灣史研究所用，亦即較少見交叉學科知識運用下的臺灣史研究。再則，多見政治史、經濟史、文化教育史等傳統研究範式，較少見環境史、醫療史、心態史等的創新研究。在史料運用上，較偏重中文史料，而忽視或未能有效利用外文史料；較注重文獻資料，而忽視或較少開展田野調查。在具體研究領域上，以日據時期為例，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不得不與宗主國日本發生大量的聯繫、有大批日本政府、企業、官員、工商業者、軍隊、教師、警察等等人員前來臺灣，然而我們發現當前的臺灣史研究對於殖民地與宗主國框架下的台日關係的研究卻相當薄弱，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日本對於臺灣的影響相對於其他方向無疑要大得多，忽視了這個方面，我們的研究必然是偏頗和不充分的。以上均為大陸地區臺灣史研究今後亟待加強及向臺灣同行交流與借鑒的重要方面。

最後，我們期待海峽兩岸的臺灣史研究能夠加強交流與合作，不論是常態的互訪、舉辦學術研討會，還是組織田野調查，共同進行課題攻關，都有進一步強化的

必要。此外，由於種種原因，兩岸在史觀上，在對一些歷史問題、歷史事件等等各個方面的解讀和觀點恐怕都有相當的差異乃至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客觀事實，任何學術領域，有不同觀點都是正常的，應該也必須從學術的角度，科學的方法，理性的態度，開展學術研討，應擺脫意識形態影響，從最基本的原始史料出發，有一份資料說一份話，相信這是兩岸臺灣史研究共同進步發展繁榮的必由之路。